



为中国而设计
建筑大师访谈录

杨冬江 李冬梅 主编
杨冬江 方晓风 梁雯 等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为中国而设计 建筑大师访谈录

杨冬江 李冬梅 主编

杨冬江 方晓风 梁雯 等著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中国而设计 建筑大师访谈录 / 杨冬江, 李冬梅主
编.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ISBN 978-7-112-11639-3

I. 为… II. ①杨…②李… III. 建筑师—访问记—世界—
现代 IV. K81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9437号

顾问: 王珮云
主编: 杨冬江 李冬梅
著者: 杨冬江 方晓风 梁雯 等
责任编辑: 唐旭 李东禧
责任设计: 崔兰萍
责任校对: 陈波 王雪竹
装帧设计: 倦勤平面设计工作室

为中国而设计 建筑大师访谈录

杨冬江 李冬梅 主编
杨冬江 方晓风 梁雯 等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凌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320 千字
2010年1月第一版 2010年1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58.00 元

ISBN 978-7-112-1163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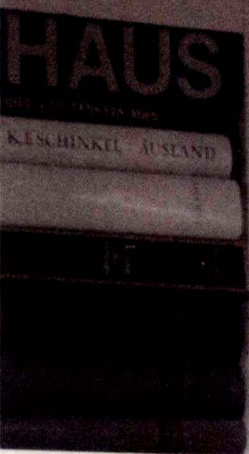
(18897)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目录

Contents

	007	贝聿铭访谈 <i>Interview with I. M. Pei</i>
贝聿铭的寻根之路	010	
	041	保罗·安德鲁访谈 <i>Interview with Paul Andreu</i>
大音稀声 大象无形	044	
	087	雷姆·库哈斯访谈 <i>Interview with Rem Koolhaas</i>
建筑的力量	090	
	133	雅克·赫尔佐格访谈 <i>Interview with Jacques Herzog</i>
激情与理性的编织	136	
	181	诺曼·福斯特访谈 <i>Interview with Norman Foster</i>
技术之美	184	
	235	矶崎新访谈 <i>Interview with Arata Isozaki</i>
“未建成”大师	238	
	283	扎哈·哈迪德访谈 <i>Interview with Zaha Hadid</i>
建筑先锋	286	
	316	参考文献 <i>Sources</i>
	318	后记 <i>Postscript</i>



Q & A

贝聿铭访谈

Interview with I. M. Pe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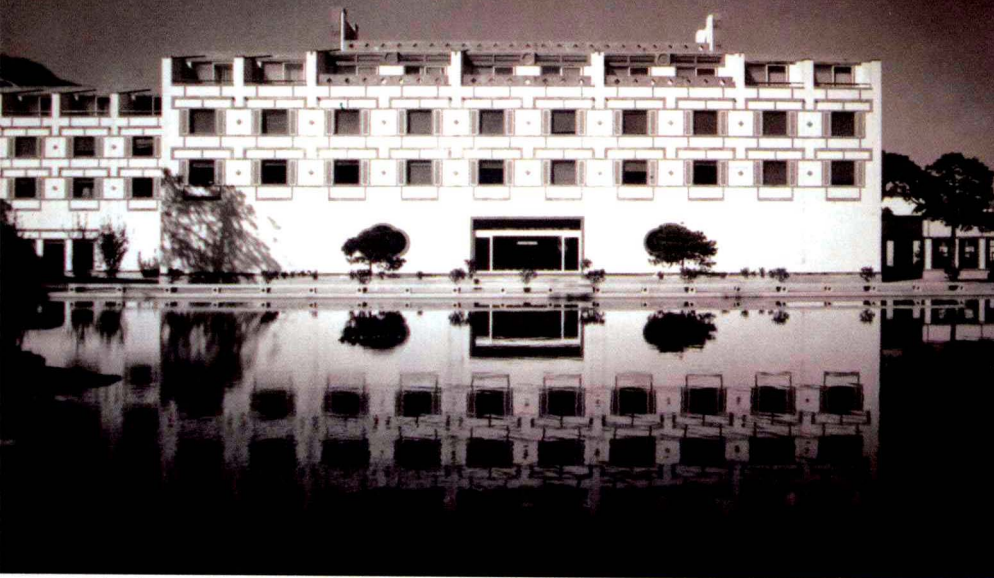
时间：2007年9月30日

地点：美国纽约贝聿铭寓所



苏州博物馆





北京香山饭店

贝聿铭的寻根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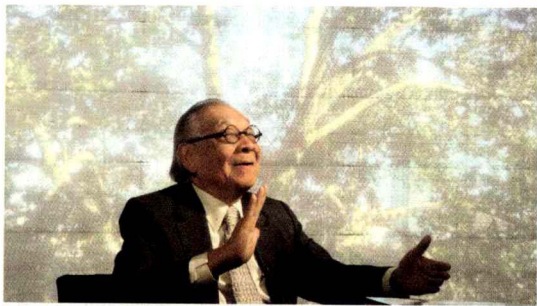
——从香山饭店到苏州博物馆

香山饭店的落成典礼如果放在今天，必定是一场媒体的盛宴，可以用名流云集来形容，共襄其间的不仅有国内的高层领导，也有许多国际名人，他们都是建筑师贝聿铭的朋友。可惜，这一充满戏剧要素的事件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报道，甚至没有留下太多的资料。对于中国社会而言，这是一场静悄悄的典礼，不要说普通大众，就是建筑业界的专家也无缘参与。

不过，这种状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尚未进入开放时代的中国，并不了解这些外宾如何显赫，而媒体也没有今日捕捉热点的敏锐感觉或者机会和可能性。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奥纳西斯（此时已下嫁希腊船王）和贝聿铭一家相伴游览了一些名胜古迹，所到之处，无人关注杰奎琳，倒是贝家时常引起人们的围观，并非因为大家知道他是一位名建筑师，而是他们一家具有中国人的外貌，举止和言谈却十足的外国腔。

当然，对于国内的建筑界而言，贝聿铭的到来以及香山饭店的建设，仍是一件引起广泛关注的大事件，人们通过有限的渠道试图尽可能多地了解事件的进程。此时的贝聿铭已非无名之辈，在那个时代，能享有国际声誉的在世华人寥寥无几，以建筑师而言更属凤毛麟角。而中国建筑师除了援外项目外，几乎同外界没有任何交流。更为可悲的是，由于经济的停滞，绝大多数中国建筑师几乎没有参与大型建筑设计的机会。

中国的建筑师们非常期待一个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名建筑师的作品，希望从中学习先进的技术、时髦的样式和设计技巧。尤其建筑师是一个在西方受教育的中国人，不同的文化背景交融下会有什么结果，都是饶有兴味的话题。然而，贝聿铭给出的答案出乎人们的意料，纵观他的一生，这种出乎意料的结果可以说是贝聿铭作为建筑师的一个特点。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法国卢浮宫的扩建等等，这些为他带来声望的作品都是同人们的期待有所距离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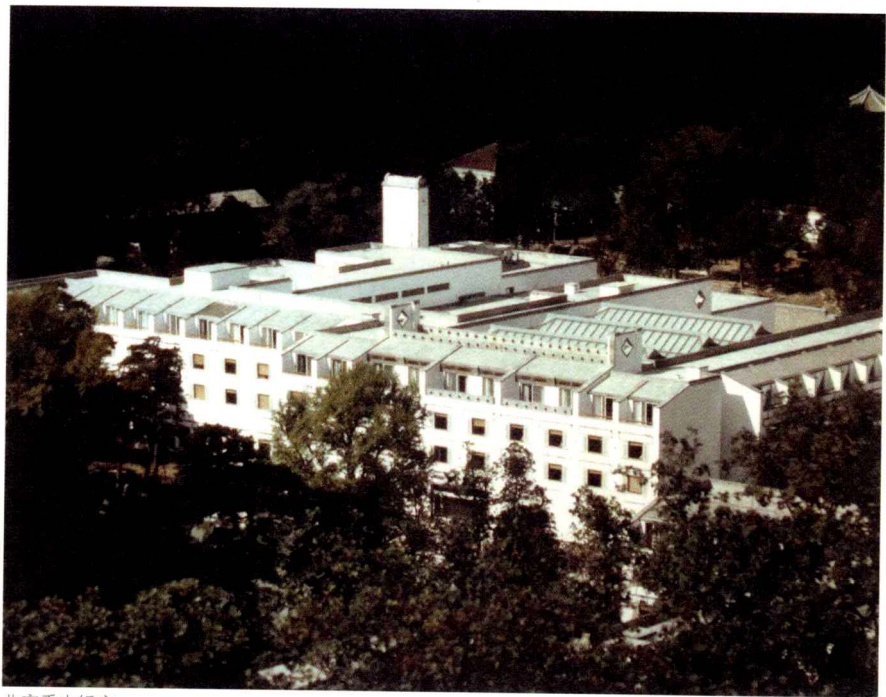


贝聿铭 / 摄影：杨冬江

Q：香山饭店是改革开放后在国内出现的第一座由境外建筑师设计的建筑，同时这也是您在祖国大陆的第一件作品。从您最初着手设计至今已经过去有近三十年的时间，在这里您是否可以再次为我们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

A：那是在1978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请我回国。我们在北京，在人民大会堂谈的这个事情，他说我希望你在中国可以留点纪念，我说应该，我在美国这么多年了，有这个机会觉得很荣耀，我接受。可是做什么工作呢？他说最好在长安街里面找，我说长安街好啊，这个地方很重要，但问题是我不想在中国做高楼，而且总觉得在那里做高楼心里面不大满意。我便老实讲我是想造一个低一点的楼。他说低楼啊，那你就到郊外去造。所以我就到处走，看地方，看了香山，我觉得很好，香山饭店便开始做起来。

香山饭店在国内受到的关注远不如其在国际上的影响，这个作品甚至被认为是现代主义转向的一个标志，尽管贝聿铭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建筑师。但香山饭店中表现出来的对地域文化的关注，显然正是后现代所强调的特征。当然，贝聿铭不会使用戏谑的手法，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是优雅和秩序。如果说，一个作品以被模仿的数量来评价其成功与否的话，香山饭店不算一个成功的作品，它没有得到广泛的模仿。它经常被谈起，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但似乎不是一个令人振奋的解决方案。那场无声的落成典礼或许反映了当时国内对待这座建筑的态度。交流的双方不在一个认知平台上，存在着巨大的落差。数年后，北京的长城饭店施工时，国内许多高校的建筑系师生纷纷赶赴工地瞻仰，那是中国第一座全玻璃幕墙的高层建筑。两相比照，差异立见。香山饭店在当时更多地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其建筑学意义上的评价还要等待更长的时间。



北京香山饭店

贝聿铭的到来是那个时代政治现实的一个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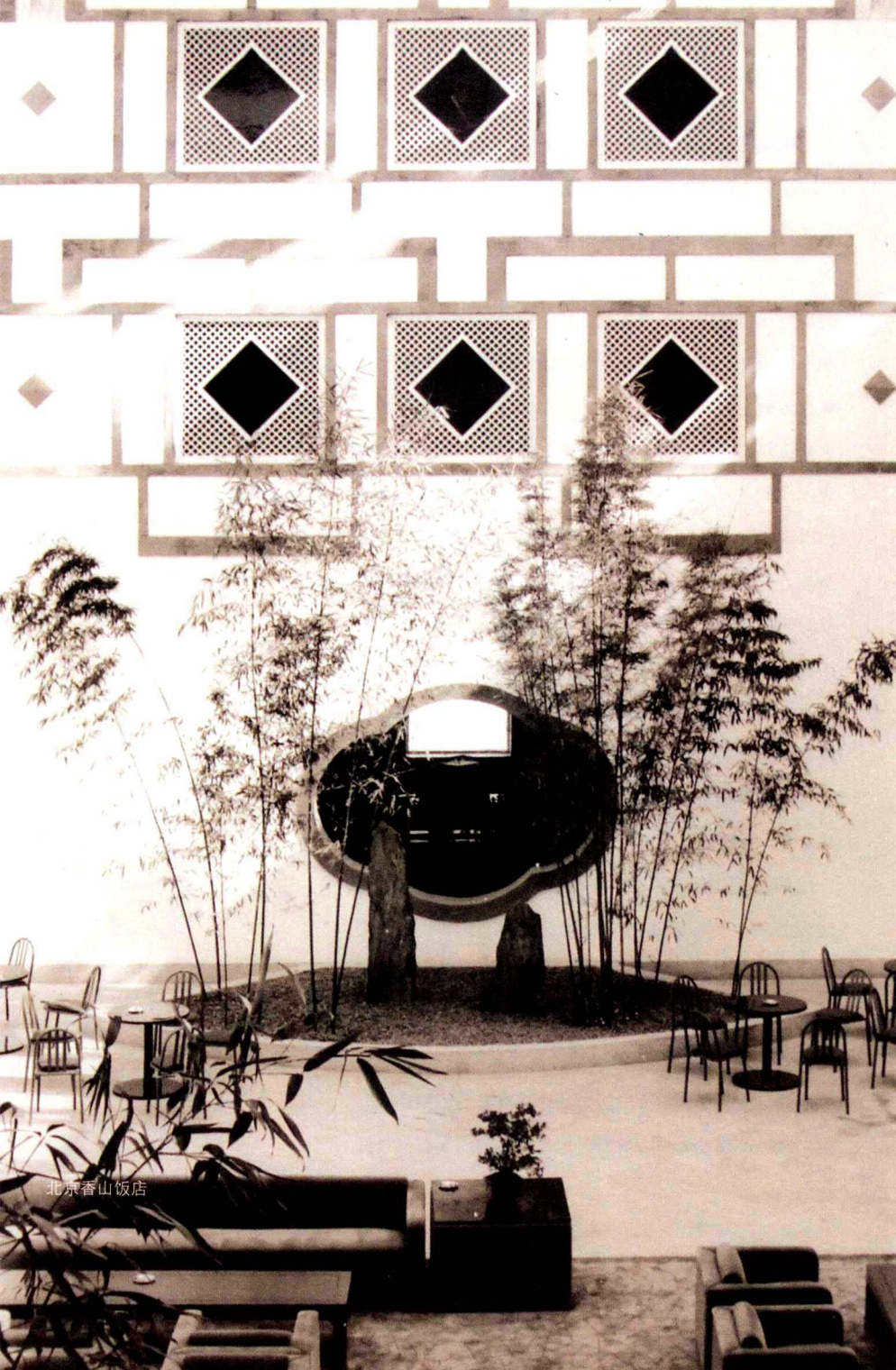
二战结束不久，世界又陷入了冷战，铁幕分割了东西两大阵营，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但中苏关系的交恶，使得中国开始谋求同西方世界的接触和沟通。传为美谈的乒乓外交是一个开端，随之而来的是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建交。尼克松成功访华之后，美国建筑师学会试探性地向中国建筑学会发函，希望能组成一个建筑师团来华访问，未料很快得到肯定答复并成行，贝聿铭是代表团成员之一。这是贝聿铭自1935年去美国留学后第一次回到祖国，此时是1974年，其间间隔了近四十年。

显然，中国对贝聿铭特殊的身份和背景深感兴趣，此时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尾声，长期的政治运动使一个大国国力枯竭，转向经济建设成为许多有识之士共同的认识。当时，贝聿铭曾受到北京当局的邀请讨论北京的高层化问题。然而，贝聿铭的从业经验却决定了他对在北京进行高层建筑建设的担忧。不管怎样，来自祖国的邀请是难以推却的，因为在那一代留学西方的华人心中，学成然后报国是最正常的逻辑。战争阻断了他们归国建设的路，一旦历史机缘敞开了大门，贝聿铭乐于尝试。1978年的圣诞节，他再次受到邀请，在双方接触时，他还有些犹豫，因为那是他准备陪家人度假的时间，结果中国方面说那就把家人一起带来吧。

中国社会面临一次重大的转型，结束极左的政治路线，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与此同时实行对外开

Q：您当初对北京以及长安街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A：跟现在的长安街是不大相同，当时新的建筑在长安街并不好，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可能是那时候刚刚起首的原因。除了长安街之外，我去看了故宫，另外还去了北京大学，看的多是原来老的东西。



北京香山饭店

放政策。封闭既久，开放也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国内外的方方面面相互都缺乏足够的了解和信任。同乒乓外交一样，政治上的僵局需要非政治领域的象征性事件来打破。邀请西方国家的建筑师来设计大型建设项目就成为一个选择。贝聿铭是华人，在西方经历了完整的职业教育，并取得了很高的专业声望。这样一位得到国际认同的华人专家无疑是担此大任的最佳人选。华人身份保证了双方交流、沟通的畅达，同时温和地表达了开放的决心和诚意，这个背景避免了民族自尊心方面可能受到的伤害。而率先引进外资和技术的上海宝钢，其建设过程就一波三折。初而兴奋，继而质疑，再而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培育的社会思维不可能马上转变，引进引发是否丧失民族自尊的争论。选择贝聿铭则可以避免这方面的争议。

中国政府希望贝聿铭的到来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现代化建设高潮的象征性开端，一场大戏令人振奋的序幕。因此，政府给出了相当宽松的条件，提供了二三十处选址和项目让贝聿铭选择，甚至提出在首都北京最核心的位置——长安街，由贝聿铭来设计十座现代化的高层建筑。

贝聿铭审慎地对待了政府方面的热情并婉拒了设计高层建筑邀请，他甚至建议当时的政府要为长安街沿线建筑设定限高（40米），认为过高的建筑会破坏北京作为古都的风貌。

Q：为什么没有选择在长安街设计一幢比较现代的建筑？

A：长安街跟香山饭店的情况大不相同，因为香山饭店是在郊外。老实说在长安街我不太敢做，因为那时对中国的情况不够了解，麻烦也很多，总觉得在那里（长安街）做的经验不够，怎么做新的东西，什么是新？没有这个把握。四年后，我在香港做中国银行就是很现代的。



贝聿铭 / 摄影：杨冬江